



试论制约日本回归“普通国家”的“精神文化因素”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武心波

内容提要：日本受岛国地理环境与自身历史和其他因素的制约，精神文化素质先天发育不足。在与外界的悬殊落差中，充满了“历史悲情”的“和魂”千百年虽几度奋起积极“补差”，欲与世界缩短差距，却“初衷难改”。日本在表面上与外界的一致，无法弥合其心灵深处与世界的巨大裂痕与反差。日本依然习惯于在心灵深处掩藏自己，每每固执地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维护与表诉着自己。精神文化因素在理性和非理性间的徘徊与跌宕，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日本向“普通国家”回归的未来政治进程。

关键词：普通国家精神文化因素 制约因素

重新整合国家或重建国家，是战后半个多世纪来日本历代政治家所苦苦思索、竭力探求和梦寐以求的“宏愿”。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曾根时代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日本要做政治大国的口号，发展到小泽一郎时代，提出了做“普通国家”的战略目标。到了小泉纯一郎时代，作为社会思潮的“新国家主义”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开始向国家政策层面蔓延和转换，日本在国家重建上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向“普通国家”回归的速度也因此而越来越快。

国家重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日本所面临的内外环境与19世纪近代民族主权国家主义向全球扩展时的情景已经大不相同，而日本自身所背负的历史包袱，也严重地制约着日本向“普通国家”的回归。“新国家主义”力量的崛起和各种制约力量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对立，并不断地加剧着摩擦和冲突。“国家主义”进程发展得越快，内外摩擦也就越大，由此而引发的各种冲突也就越激烈。因此，日本向“普通国家”的回归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历程，也是一个十分险峻的孤独跋涉的政治进程。

与外部摩擦相比，来自于日本民族内部的摩擦因素是不可忽视的最大变量。日本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国家，其特殊性更多地体现在民族素质和民族的精神结构之中。本文将聚焦这一领域，尝试通过对日本民族的精神文化的分析，来探讨日本的民族精神是否能承托得起日本向“普通国家”理性回归的进程，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影响与制约着这个进程。

一 “和魂”的历史悲情

最初使用“大和魂”一词，是在10世纪末11世纪初，系指自主的气魄和处世的才能。我国学者李泽厚说：“什么系‘大和魂或大和精神’？简言之，我以为，它是某种原始神道信仰的变换发展和不断伸延。也许由于与四周容易隔绝的地理环境（多山的岛国），文明进程较为缓慢，各原始部族对众多神灵和人格神的强大信仰在这里被长久保持下来。”

而在对“和魂”的追本溯源方面最具权威性的则是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顾问梅原猛了。上世纪80年代，以梅原猛教授为首的京都学派通过对欧洲哲学的广泛研究，得出了一个很有新意的结论：西方的文明像瘟疫一样威胁着现代世界，唯一的医治办法是“要到东方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化即日本精神中寻找”。梅原将日本文化一直追溯到太古时期的绳纹陶器文化时期，说这种文化始于1.2万年前，“早在中国的文明改变日本的面貌以前”，在诸如阿伊努人之类的少数民族中即已存在。他认为，其实，早在绳纹时代，日本人的世界观即以“生命一体感”为其基础，它隐藏于日本人灵魂的深处，故命之为“绳魂”。并指出：“弥生时代以后的日本人，无论怎样发挥‘弥才’，他们的‘绳魂’都照样存在于他们心灵深处。”梅原认为，绳纹文化才是日本文化的基层文化，主张在今天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濒临崩溃的危机之时，挽救文明的原理存在于日本的深层文化——绳纹时代的狩猎采集文化之中。梅原将“绳魂”确立为“和魂”的基础，并认为是其本源或源头，这是非常深刻的分析，也是一个准确的基本判断。

日本学者上山春平也以相同的课题为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导入了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日本文化进行了深刻的解剖。他认为，在日本文化发展中，从层次上看，旧物为深层，新物为表层，旧物不断为新物取代而由表层

下沉为深层。他说，日本祖先使用的石器、土器等，从新的东西到旧的东西分层被埋在地下，这象征着先祖的文化成层地潜存于今天的文化深层之中。而构成今天日本文化表层的是适应所谓“大众社会”、“信息化社会”这一社会现状而采取的具有国际特色的文化，具有浓厚的欧洲色彩；但若剥去这一表层，其下层沉睡的是中国文化色彩很强的农业社会的文化；再下层便是绳纹时代，即农耕以前的狩猎采集文化。绳纹文化的遗产，在弥生文化以后的农耕文化中一边变换形态一边生存下去。以后虽几经变形，但仍以种种形态继续生存下去。也就是说，已经过去的荣枯的诸文化——它们被隐匿在活着的文化背景下，虽没有表现于表面，但对日本的生活和文化仍然起着作用。显然，上山的推论进一步印证了梅原的观点，即“绳魂”是“和魂”的本源，是日本民族“精神结构”的基础。

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根基。在一个民族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澎湃江河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段积淀凝聚进而升华的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生存谋略等一系列稳定的存在方式，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那样，将长久地甚至永远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与发展潜力。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它是“上帝”留在这个民族身上的“胎记”，永远不能磨灭。

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有其共同之处，无论哪个民族都是从氏族社会演化来的。问题是，走出氏族社会后，东西方发生了历史分叉，西方进入了个人主义社会，而中国则进入了家族社会。它显示出了两个不同的历史进路，并因此而将世界一分为二：西方的个人本位世界与东方的家族本位世界。但日本则不同，依然没有从氏族社会中走出，带着氏族社会的枷锁迈入了阶级社会，而且不是自己迈入的，是被中国文明强行推入到了阶级社会。如戴季陶所说：“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地面的差异、人口的差异都在十倍以上，而文化的差异却是差了几千年。当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日本地面还是穴居野处的生蕃，便是他所谓的天孙民族的这个阶级，还不知是在何处？”

但被强行带入到阶级社会的日本文明，并没有因此而自觉地脱去身上沉重的氏族镣铐，而是将此作为自己的原生文明珍藏了起来，成了大和民族的灵魂。这样，日本的自我进化能力便早在绳纹时期就因外来文明的强力介入而丧失了，民族性也因此而被定格在了绳纹时期。绳纹时期日本尚还处在母系氏族的原始晚期阶段，那时的人还没有从蒙昧状态中摆脱出来，人性中野蛮原始的成分较多，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那一阶段的人更多的是关注物质和功利，而没有剩余的经济力和闲暇的时间去进行物质生产以外的高雅活动，以提高人的自我素质，丰富人性。日本的不幸恰恰就在这个时段上其人性的发展被定格在了原始蒙昧的阶段，失去了内部的自我进化的功能，成为原始文化的化石，一直被保留到了今天。

由于绳纹文化和“外来的”新文化的融合正好发生在日本民族的性格形成期，所以对日本此后养成从大陆吸收先进文化的品性有相当大的影响。日本文明失去了自我前进的动力，靠外部生出的助推器来发展，原有的文明成为该民族的基础和本体。日本在此以后的发展，由于片面地依靠外部进化装置的推动，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涉及深层的人性灵魂层面，而是仅仅在表层，在外层，在器物层面不断地更新和发展着，而作为内在深层的人性与精神部分则被严密地封存着，维护和继承着，长久地处在一种窒息状态和野蛮原始的淳朴状态之中。这样，日本人的认知能力和其人性一样，因难以摆脱过去的束缚封闭的停滞状态而始终得不到自由洒脱的发展，长期处在早期人类孩童般的认知水准上：感性大于理性，具象大于抽象，传统大于真理，神话传说大于是非善恶，等等。

“和魂”的传统魅力也是它现代的历史悲情所在，失去了自我进化的内在能力而不得不靠严格地复制传统，靠对原生文明的精心呵护以不使之遗漏点滴来延续原生文明原貌的这种自我维护的态度（虽然从更高的层面看“复制传统”也是一种文化遗传现象），从中所能折射出的当是对传统文化百般呵护和百折不挠地加以捍卫与继承的感人的精神，但同时也展现了一个民族在失去了对文明的发展与再造能力时的悲哀幽怨之情和痛苦绝望之态。

“和魂”的历史悲情直到现在还在绵绵地延续着，而且还似将要长久地延续下去……

二 未成熟的社会

“日本是个未成熟的社会。”这一看法最早来自于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1951年，麦克阿瑟在美国上议院说“日本人实际只有12岁”。他说：“德国与日本是完全不同的。德国的国民是成熟的国民，如果说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科学、艺术、神学、文化方面是45岁的话，那么德国人则与我们同样成熟。但是，如果用现代文明的标准来衡量，盎格鲁·撒克逊是45岁的话，那么日本还只是一个12岁的少年。要让他们接受柔软的新观点。”麦克阿瑟的这番讲话，最终换来的是日本人对他的片叫骂声，并将对他的感激与尊敬之情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日本人反目为仇，没有原谅麦克阿瑟，时至今日仍耿耿于怀，并难以释怀。

当然，日本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麦克阿瑟的这段“精彩言论”的反思。在二战结束50年的1995年，《朝日新闻》发表文章认为，麦克阿瑟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麦克阿瑟作为日本人的保护者，对日本人抱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所以才认为日本人必须彻底地接受教育。看来，日本的主流舆论至今仍未能从更深的意义上领会出麦克阿瑟这番话的真正含义。相反，倒是独具慧眼的新生代政治家小泽一郎看出了其中的门道。他说：“这样的日本人，虽然的确个头儿长得很大，但精神结构、头脑方面则完全没有成人。现在的日本人正是这样一个‘大草包’。”小泽所描绘的日本人形象是：“从历史上看，日本人在两千到三千年间一直生活于四岛之上，并维持了世界史中也称得上奇迹般的和平……封闭于日本人社会之中。所以，还没有确立自我……”结果，“身形倒是长大了，而精神结构则还处于摇篮期——躺在摇篮里”。这样的日本人，“绝对不探讨什么深刻的问题……像虫子一样……生活着，简单地说就是什么都临时应付。只会采取临渴掘井式、……头痛医头式的做法”。用语虽然粗俗，但却一语中的，振聋发聩。

苏联学者施米特在《日本的自然环境》一书中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说，由于日本人世世代代在小块稻田里从事耕作生产，从而使他们养成耐心、精细、审慎的品格，同时，也产生了务实、对抽象问题冷漠的性格。如在古代日语中，表示山川草木等自然物的词语很丰富，但却没有相当于汉语中的“自然”的词汇。这说明，在古代日本人的认识中，虽存在作为具体物的山川草木，但并没有形成对它们加以抽象概括的“自然”概念。日本学者源了圆则把日本人不喜欢思

辨、形而上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说成是日本文化中的“即物主义”性格。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中江兆民更直截了当地说：“日本没有哲学”，而“没有哲学的民族，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就降低了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

在日本的文化传统中，缺少归纳和总结，而多是对事物本身的直觉式的认可和评价，在日本人的思维中，一切都是十分含混与模糊的，充满了矛盾和暧昧，但却能被日本人的认知系统所统摄与涵盖，形成极不协调的自我同一，如生与死、善与恶、人与神、物质与精神等相互对立、对应的概念在日本文化中被认为是自我同一的关系。

幼稚的认知能力与混沌的精神状态将日本带入了不辨是非善恶的相对主义境界。日本普遍信仰的神道传统缺乏一致性的系统经典和戒律也培养了日本人的功利主义处世哲学，形成了其具有功利导向的多维相对主义的精神结构与思维方式。这种态度使日本人处理世事的原则不是依据精深宏大的理论思辨，而是从简便易行有效的原则出发，表现出浓厚的功利色彩，从而使得日本人不为常理所拘而善于适应环境，不为原则所困而呈灵活多变之特性。中江兆民说：“日本人极其明白事理，很会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前进，绝对不抱顽固的态度。”但这也使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学习表现为肤浅的表层化与庸俗化现象，而且从源于绳纹时期千古不变的“和魂”中总也无法发育出具有普世功能的深厚成熟的人道关怀，更没有出现类似中国的大同思想和西方基督教的人文传统。即便是宗教祭祀，在日本人那里也只是为了祈福禳灾而不是把心灵献给神的忏悔。

因此，到今天，日本人的羞耻感和历史感都有着极深的前现代印迹，并未经受文明之光的照耀和洗礼。如余世存在《如何理解中国人的日本情怀？》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日本的现代化成就中，最令人惊异的，是它的组织化和技术化程度。这是建基于家和企业之上的组织化和技术化，在其可以仿效的时候，如西方文明成为其仿效对象的时候，它可以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在其独立存在并试图创新时，却往往成为文明眼的笑柄和悲剧。工蜂般的经济动物、过劳死、千人斩、集体嫖娼，无不打上了未成年状态的蒙昧、无耻和无义。一国国民在未得到充分社会化和充分个体化的时候，无论其组织化和技术化程度多高，都不免于未成年状态的某种蒙昧，这种蒙昧甚至打上了兽性的烙印。”

精神年龄的幼稚，决定了日本民族的理性能力还基本处在漫画阶段、形象思维阶段，还没有上升到高度抽象综合的阶段。这样的认知能力，再加之各种古老神话、古训、传统规范、规约的“干预”，日本民族在认识上有多少客观性、准确性、完整性，便可想而知了。

三 独特的话语方式

日本是个极其独特而又难以被其他民族所理解和认识清楚的民族，一个谜一般的民族。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高估了日本，而日本又将用自己用最先进的物质外壳巧妙地伪装了起来，并将日本最本质和最真实的一面给严严实实地遮蔽了起来。这样，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日本，便是一个外表十分鲜艳，而内里则是一个深不可测并充满了矛盾的古怪的民族，一个让人目眩的特殊国家。

近代以来日本所建立起的话语体系是独特的，日本人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特的话语解释权，总是用他们独特的话语方式对那些过于繁杂先进的东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拿来再说，然后慢慢地消化，其方式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按照功利主义原则，用自己熟悉的、符合自己认知水准的话语方式来解读和消化它。因此，在被引进的东西和日本所接受的东西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表面上日本似乎已经成了与发达国家无区别的先进国家，但这只是表面，因为日本早已从内部用它自己所熟悉的一套古老的方式将外来文明的原则与实质给颠覆和篡改了，从而使得古老的文明穿上了现代艳丽的服装，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重新出现，不仅化解了传统与现代的紧张，而且也同时获得了合法的生存权利。在对外来文明的消化和解读上，大多比较肤浅，总是按照自己的喜好牵强附会地任意解释，甚至还会出现风马牛不相及乃至相反的结果。为此，有人说日本人对外来文明的解读在思维上是缺乏逻辑和混乱的。对此，丸山真男认为，日本的思想家有一种把这些思想要素任意地和折中地杂糅起来的倾向，因而日本思想的展开具有缺乏连续性和逻辑上的连贯性的特点。

日本人的这种矛盾性格，源于其理性能力的贫弱，缺乏对是非的抽象鉴别能力和理性的逻辑判断力。西方学者桑索姆说：“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善恶的能力，或者说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日本人实际生活中堂而皇之地主张所谓“必要恶”的观念，认为善行未必都是需要的，而有些恶举往往不可缺少。因此，需要便是善，有用便是善，在此前提下任何恶行皆可被接受、默许。李泽厚说：“日本人比中国人不仅对理性、思辨、推理等更加缺少兴趣和动力，而且重要的是，其情感受理性的规范、渗透、交融，或者说其理性化特别是合理化的情况、程度，即其情理结构的状态，与中国有相当大的差异。它保留着更多的自然情欲、本能动力的原始状态和非理性的因素。一些日本文化的研究指出，日本精神或者日本文化中常常可以看到矛盾的两面：一方面是坚持传统，固执保守，相信命运；另一方面又讲求功利，适应现实，好奇进取。一方面是彬彬有礼，循规蹈矩，顺从胆小，随波逐流，文雅爱美，极端地自我克制和压抑，这是他律强制，即外在的理性约束；另一方面又是野蛮无礼，凶残冷酷，好斗嗜杀，极端的自我放纵和发泄，这是情欲冲动和内在非理性的展露。这种突出的双重性格，在今天的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也仍可看到。”

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是氏族式的集体性求同思维，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严格地按照神道教所规定的程序和范式，在集体思维的框架内进行着“集体性思维”，在岛国的天然框架内进行着“集体共振”，因此，在思想上具有极大的一致性 or 同质性。此外，关键的问题是其思维的指向不是弄清事实，究明真理，而是在表达一种集体意向和对某事的一般看法和普遍的态度，而这种看法和态度又是建立在集体主观认知基础上的，是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在集体认同与真理之间，集体认同的力量是大于真理的，即便是在外人看来十分明了的真理，如果不为岛内集体所认同，并被反对的话，也不会得到承认，并被接受，即便是谬误，如果得到了岛内或共同体内部的集体认同，那么也会成为“有力的看法”，并被接受，成为左右人们行为的准则。而集体反对、认可与否，又与集体的认知程序和认知能力有关。认知程序又受到神道教的规范、古训、惯行等传统思想遗产的制约和规定，因此，始于绳纹时期并被严格复制照搬的古代传统文明对今人的思想制约是巨大的，也是无孔不入的。古人拖累了今人，而今人的认知能力则因严格地遵循古训而日趋贫

弱，成为民族的一大负面遗产。

因此，如果人们仅仅从表面的物质外壳来看日本是永远无法理解这个十分古怪而又特殊的国家的，而必须首先熟悉和了解日本自己所拥有的一套儿童般的话语体系，而这套话语体系又往往是古老的，基本上来自于传统，来自于过去。因此，不了解日本的历史和它的昨天，也就不了解日本的今天。而今天的日本，其表面繁华让人眼花缭乱的程度是任何国家所不能比及的，但其内里的单纯程度也是所有的人难以想像的。可以说，“日本问题”是最具有欺骗性的问题，也是让所有习惯于按一种标准来分析问题的人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

四 未成熟的国际精神

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曾经指出，日本的外交原则就是没有原则，它放弃了所有的价值判断而只求生存。这种功利导向的多维相对主义精神结构，造就了日本民族漠视绝对理念、不会恪守任何绝对的原则，在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上面临选择时，往往表现出随机应变的实用性特点。

由于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孤立的岛国具有对外部事物的独到而细微的观察力与深刻的感受性，日本人对环境有着异常的敏感性。这种感受能力与功利导向的多维相对主义精神结构相结合，使得日本民族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很少从双边、多边的整体利益来考虑问题，而是更多地依据自身的需求，以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的狭隘的“自我”为原则。约翰·托兰在他的《日本帝国的衰亡》中这样描述日本人：与西方人黑白分明的思想方法不同，日本人的界限比较模糊。在国际关系中，日本人讲究的是“政策”而不是“原则”。日本人似乎是没有道德心的……他的逻辑就像日本人用的包袱布，可大可小，随机应变，不需要时，还可以叠起来装在口袋里。

在这种十分幼稚古朴的相对主义的理念支配下，不少日本国民缺乏明确的是非理念和辨别是非的能力，而喜欢模糊、神秘、感性、体验和矫情的做作。这样的理性能力，是不足以抵御人性中的残暴、野蛮、贪婪、冷酷等低劣情操的，更何况日本人的人性进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又几乎处在停止的状态而没有得到净化和提炼，这就更促使日本民族一旦失去本已十分脆弱的理性的控制，便会以近似于歇斯底里的状态将其被现代文明所掩盖着的原始本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十分残忍和邪恶的欲念、手法、心态和人生态度去对待其他民族，亵渎现代文明。二战即其一例。直到现在，不少日本人还无法正确地认识自己的责任。这不是故意的，而是缺乏认识自己错误、明辨是非善恶的正常能力。日本人依然十分习惯于用神话传说和神道的观念来看待和解释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沉溺在传统和神话的境界之中而难以自拔。

日本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大同思想之类的人文关怀，也没有国际关系中的平等观念。当幕府末期日本卷入世界性的国际社会之后，日本统治阶级自感或者成为奴役别国的强者，或者成为被奴役的弱者，除此没有其他选择。而在其传统意识中，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便大力推行“富国强兵”政策，一方面对强于自己的欧美列强献媚、迁就并努力赶超，另一方面对亚洲邻国则傲慢、蔑视、肆意欺凌，必欲亡之而后快。明治维新后，日本对朝鲜进行侵略活动，国内几乎无人反对，连民权运动人士亦热衷于在朝鲜制造动乱。甲午之战获胜后，日本举国欢庆。日俄战争则因俄方实力较强使日方遭受较大损失，因而国内反战者较多。20世纪30年代挑起侵华战争时，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几乎没有反对意见。40年代初准备对英美开战时，鉴于对手实力强大，国内持反对意见者较多。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多数日本人把在国内受到的种种限制与压力转向外部，支持政府的扩张目标，在发动侵略战争、进行不平等的经贸贸易、殖民式的移民垦荒中寻求出路。即使在战后，日本官方人士在对二战进行检讨时，多数的看法还是认为对美开战是以弱击强最后导致太平洋战争失利，因此属于决策失误，很少真诚地从人道与国际平等的立场出发反省对中国及亚洲各国所犯下的罪恶（有时迫于国际压力而做一些忏悔的姿态以敷衍了事）。日本念念不忘其遭受盟军空袭及原子弹轰炸的伤害，而不愿或很少提及诸如南京大屠杀之类的对亚太地区各国施加的暴行。凡此种种，表明日本人判断对外政策是非得失的标准仍然是功利性的，缺乏道义原则。这些无不与日本传统的价值观与思维模式的影响有关。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其来源之一是武士道精神，来源之二是日本神道教、佛教以及儒学中的封建糟粕，来源之三是皇国、神国史观，进入近现代以后，又加上了从西方引进的一些所谓理论体系，因此，是十足的封建主义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腐朽、反动思想糟粕的大拼盘，其拼凑的内容和混乱的表述往往使人难以分类和把握其逻辑层次。”这种十分褊狭杂乱的相对主义精神结构，使日本人丧失了道德是非观上的绝对正义观念，总是以功利为标准来鉴别“正义”与否，以一时一地发生的事件为对象，而难以超越具体事物进行抽象的道义评判。所以，日本民族的所谓正义感本身极富功利色彩并缺乏普世的道义标准和理性色彩，因而日本是“一个可以为实现利益而调节正义的极便利的国家”。

日本的现代化对世界的影响也是有限的，甚至是片面的，这与日本的自身理性力量的欠缺有关。“日本现代化成功背后的不足是致命的，它的影响虽然已经辐射东亚地区，但它远不是给这些地区的人民提供新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领域里，它提供给亚洲国家的更多的是消费品，而不是精神沟通的创造物，不是自觉觉他的生存质量。换句话说，用西方人的概念，日本人还停留在人的史前史阶段，属人的全部丰富性尚未能为日本人反思意识到，用中国人的话，它尚不具有‘生命的厚味’。因此，无论日本怎样富有，怎样在亚洲国家招摇，也永远无法与有着久远文明传统的中国相比。亚洲国家，仅就中国和印度两国来说，历史和现实都是错综复杂的，哪里是日本从西洋人那里学得皮毛即可以指东打西、说三道四的。如美国革命期间的潘恩所说：‘一个岛国不可能统治一片大陆，这不过是个常识问题。’”

近年来日本热衷于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欲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和责任。但国际舆论对此表示了反对，如韩国《朝鲜日报》2004年9月23日发表社论强调，衡量日本能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能以金钱而应以道德为标准，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存在道德障碍。社论指出，尽管日本向联合国提供的会费、开发援助等居美国之后列第二位，但审查日本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时，不应只考虑它向联合国提供了多少资金，更要看它在道德上是否合格。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邻国反对，坚持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就是可供衡量的典型事例。

结语

未成熟的社会与未成熟的国际精神，使得日本向“普通国家”回归的历史进程充满了变数。由于缺少理性力量的历史积淀，在失去理性为先导、为系统的首要控制力量的前提下，各种非理性因素就有可能在历史突变的过程中成倍增加，并形成合力对日本的政治进程产生巨大的干扰。在向“国家主义”一元政治进程的历史回归中，民族精神中功利主义原则的一如既往，将形成与人类理性原则的全面对峙的局面；日本民族的偏向于功利性的选择习惯，则必然要排斥理性和道义，以十分利己和功利的心态，在诸多矛盾、冲突和选择中，放弃国际道义而选择一国之私利，放弃原则而选择“恶”等等。

特别是当国际与国内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国际政治大有向“森林原则”方向回归，整个国际社会又似乎呈现出要重回“中世纪”的野蛮时代的态势时，当国内政治充满了暴民的激愤和革命的激情时，日本的向国家主义方向的理性回归就很有可能被非理性的力量所扭曲或终结，甚至是被“恶”所控制或取代，非理性力量很有可能转化为主宰局势的主导性力量。在人类固有的私欲和贪婪的推动下，对权力与利益的赤裸裸的争夺又将再度成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彼此呼应的一个新的燃爆点，成为新形势下国际关系重组和力量与资源再分配的一个新的血淋淋的杠杆与中轴。

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对人类理性再次考问的时代，而这样的时代，对理性力量薄弱而又急功好利、正处在关键的历史转型期的日本民族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范作申：《日本传统文化》，三联书店，1992年，第31页。

李泽厚：《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http://www.yuandao.com.zazhi.5ji.zrwhxlbjsslq.htm>。

梅原猛：《日本人与日本文化》，《日本研究》1989年第3期。

梅原猛：《日本的深层》，载《日本文化模式与社会变迁》，济南出版社，2001年，第29—30页。

戴季陶：《日本论》，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103页。

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9页。

門司正之「日本社会意識考」、近代文芸社、2000年、11頁。

同上。

『朝日新聞』1995年5月25日。

转引自浅井基文《日本新保守主义》，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99、85页。

杨薇：《日本文化模式与社会变迁》，济南出版社，2001年，第38—39页。

彭玉龙：《谢罪与翻案——德国和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罪行反省的差异及根源》，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

中江兆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第16页。

余世存：《如何理解中国人的日本情怀？》，中国思维网：<http://www.chinathink.net>，2003年10月30日，摘自《世纪青年》。

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岩波新書、1961年、8頁。

同上书，第160页。

李泽厚：《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http://www.yuandao.com.zazhi.5ji.zrwhxlbjsslq.htm>。

参见张望：《不反省历史，日本难成政治大国》，《信报》2002年4月26日，国际评论版。

参见“思想的境界”网站，<http://lyg1999.126.com>。

汤重南：《庞杂的精神糟粕——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剖析》，光明网，<http://www.gmd.com.cn>。

堺屋太一『日本とは何か』、講談社、1992年、154頁。

南风窗：《我们的日本是亚洲的痛》，中国视点：<http://cnview.51.net>，2003年6月20日。

新华网汉城，2004年9月23日电。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地址：北京张自忠路3号东院 电话：64014021 传真：64014022 E-mail：ijcs@cass.org.cn